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熊月之
编

冯桂芬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熊月之
编

冯桂芬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冯桂芬卷/熊月之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20168-9

I. ①中… II. ①熊…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冯桂芬 (1809~1874)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899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冯桂芬卷

熊月之 编

Feng Guife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67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冯桂芬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有诸多事功实绩的实行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得以舒缓。经他倡导和擘画，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不论在此消彼长的思想长河中，还是在为国为民的躬亲实践方面，冯桂芬对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都有重要影响。

一、生平简历

冯桂芬，字景亭，一作景庭，号林一，晚号濶叟。嘉庆十四年（1809年）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府吴县一个“有薄田十顷”^①的地主家庭。父亲冯智懋中年多故，家中又多次遭遇火灾，家境在当时也并不很富裕。冯桂芬自幼聪颖，记忆力尤好，在私塾读书时成绩优异。十九岁，补吴庠博士弟子员。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四岁的冯桂芬在苏州最有名的书院之一正谊书院读书。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到书院考课，对冯颇为欣赏，将其招至署中读书，并让他编校自己所辑《西北水利说》。从道光十三年到十八年，冯桂芬前后共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落第，心中不免有些沮丧。“落花时节每相逢，一度来游一凄绝”^②的诗句，便是其当时内心独白。

道光二十年，冯桂芬第四次参加会试，终于高中一甲二名，赐进士及第，俗称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其后，他充任道光二十三年的顺天

① 冯桂芬：《五十自讼文》，见《显志堂稿》，卷十二。

② 诗后自注：癸巳以来每下第，辄就馆是邑。参见冯桂芬：《顾侍萱学博蓉湖渔隐图》，见《梦奈诗稿》，3页。

乡试同考官和道光二十四年的广西乡试正考官。从广西回京后，仍在翰林院供职，任国史馆协修、教习庶吉士等，参与编纂《实录》。

道光二十五年，冯母谢氏逝于京邸，冯桂芬扶母榱南归吴县，守制在籍。道光二十八年春，服闋。因顾虑父亲年迈，不欲至京师，乃在金陵主讲惜阴书院。是年冬，奉父北上京师。两年后，正当冯桂芬在潘世恩引荐下，得蒙皇帝召见，可在仕途上一展抱负之际，丧亲之痛再次降临，其父在京去世。冯桂芬又归苏州守制。此后两年，他在扬州修盐法志。

咸丰二年（1852年），冯桂芬守制期满，正欲赴京供职，不料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运动打乱了他的行程。翌年，太平军占领金陵，冯奉旨在苏州办理劝捐、团练。其时苏州居民迁徙一空，冯桂芬与同人议设协济局，劝各富户输捐馈饷。又在城厢内外议设团防，有力地支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咸丰六年，冯桂芬在吴县光福镇建立善堂，名为一仁堂，为当地慈善事业打下了基础。咸丰七年，冯桂芬被劾劝捐舞弊，后经查实得白。其实因均赋一事，他得罪了地方大户，乃为流言所中。

咸丰八年春，冯桂芬北上京师，抵京时已以逾期开缺。他在京候补年余，感到皇帝对自己不再赏识，因此感叹人人老境，对仕途心灰意冷，遂想在学问上做些成绩。咸丰九年秋，请假回籍休养。

咸丰十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城，冯桂芬流离失所，最后避地上海。翌年，应江苏巡抚薛焕之聘，主持上海敬业书院，并完成《校邠庐抗议》四十篇。他与潘曾玮等人一起策划上海中外会防局，力主“借师助剿”，终使太平军被镇压。与此同时，他们也向曾国藩乞师援沪，致曾国藩的书信便出自冯桂芬之手，此信对说动曾国藩援沪起了重要作用。

同治元年（1862年），冯桂芬因欲申其减赋夙愿，入李鸿章幕。苏、松、太重赋一直是冯桂芬关注的问题，他乘机向李鸿章提出减赋之事。李将此事交托给冯桂芬和粮道郭嵩焘办理。冯桂芬代曾国藩、李鸿章起草了《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在疏中，他提出减额之效利于民又利于国。经他与其他一些江南士绅的不懈努力，减赋一事终于成功，经中央核定的减征办法，关于地丁漕项银，不减定额，而减浮收；关于漕粮，苏、松、太减少三分之一，按轻重分别递减，原额重者多减，原额轻者少减。这对舒缓江南百姓的赋税重压起了积极作用。

同治二年，冯桂芬奉命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任首任监院。他拟定了学馆的总体规划，对学馆的办学宗旨、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都有具体设想。晚清中国共有三所官办外语学校，以广方言馆成效最大，这与冯桂芬在开创之初的良好擘画不无关系。

寓居上海期间，冯桂芬亲历深受西方影响的上海租界，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同治三年，冯桂芬返回苏州，主讲正谊书院。此后，他定居木渎，编修《苏州府志》。

同治十三年，冯桂芬病逝。

二、思想主张

冯桂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中外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从天朝大国到列国之一，从天下无敌到城下之盟，从闭关锁国到被动开放，从自给自足到贸易通商，从大刀长矛到坚船利炮。冯桂芬在鸦片战争爆发那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此前，他主要是读书、应考；此后，他主要是做官、治事。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各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亲历、亲见或亲闻了时代的巨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他在京城，主持禁烟事务、坚决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他的恩师，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是他的好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对外交涉，但是，他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时，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是对外交涉前沿，一是西人聚集之地。他参观过租界，接触过西人。他的学生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人译书，时常带给他有关西方的信息。他有机会了解中外大势，了解中西差别。

冯桂芬生性沉静，长于思考。当一般人还欣欣于“万年和约”，或斤斤于“夷夏之辨”时，他已经认识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①他已经明白，中国虽为天下大国，但不是天下中心，中国面积仅占地球十五分之一，其余国家有百来个。中国想要在世界强国之林中有一立足之地，必须面对和适应已经变动的世界格局。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以下凡引用《校邠庐抗议》文字，只注篇名。

“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①变局的思想在冯桂芬心中开始酝酿。

变局虽应势在必行，但也绝非易事。冯桂芬看到中国有很多地方不如西方，他指出：“而今顾颡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②但这种不如人，不是中国人天赋不如人，而是后天努力不如人：“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③冯桂芬归纳中国不如人的地方，集中在六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当然，这六不如夷，是冯桂芬在《制洋器议》中集中叙述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国不如夷人处，远不止这六项。

找出差距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古今这两对矛盾往往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障碍。为了消解、缓和、调和这两对矛盾，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西学中源、师夷制夷、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等思想以作为变革的依据。在冯桂芬这里，他鲜明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④的口号，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所谓“古先”，自应包括祖宗成法；所谓“蛮貊”，当然包括西法。所谓“善”，就是有效、有用，能富国强兵。冯桂芬认为古今之别并不重要，中西之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善与不善，善是唯一标准。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反省本国文化、吸收别国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

鉴于此，冯桂芬又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此前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冯桂芬则将学习内容大加扩展，包括学术层面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龙尾车、虹吸、采矿机器、浚河机器；制度层面的贫民救助、人才教育、人才选拔、民情上达、君民不隔，甚至依稀涉及精神层面的“名实必符”问题。他还认为学习西方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⑤，能够做到“自造、自修、自用”^⑥。冯桂芬将“师夷”与“变法”进行有机的结合。采用西

①②③ 《制洋器议》。

④ 《收贫民议》。

⑤⑥ 《制洋器议》。

学最重要的途径是变科举、兴教育，在冯桂芬变法主张中停武举、设特科、设立“翻译公所”都是其体现。冯桂芬认为，洋器不难学，西学不难学，难的是聪明人不肯学，说到底是价值导向、社会风气。于是他提出国家应改变对西学人才的使用机制问题，应“特设一科以待能者”^①。顺着采西学的思路，冯桂芬提出了“鉴诸国”的变法主张。变法，在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有一条叫“法后王”，冯桂芬主张，在“法后王”的同时再加上一条“鉴诸国”，“法后王”着眼的是时间维度，“鉴诸国”着眼的是空间维度，“法后王”体现的是历史眼光，“鉴诸国”凸显的是世界意识。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过其议论“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也说过其变法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似乎“三代圣人之法”是衡量善与不善的最高标准。仔细一想，这两句话与上述“法苟善”那段话是相互冲突的，是两个标准。对此，丁伟志敏锐地指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所谓“三代圣人之法”云云，是一篇言不由衷的自我表白，起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包装作用，既掩饰了提倡西学的激烈倾向，又堵塞住已经发生的和将会遭到的离经叛道的一类责难。^②“法苟善”这两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校邠庐抗议》的总纲，“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是除旧，“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是布新。两者合起来，构成了变法的全部内容。

比起早十几年的魏源来，冯桂芬的变法主张更为全面、系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外交各个方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冯桂芬出身于下层，懂得民间疾苦。他出生在苏州，那是赋税重、民生苦的地方，也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的地方，饱受战争之害。他深受重赋之苦，母亲之家即为催科所破。他研究过漕运，接触过盐政，考察过黄河，丈量过土地，了解过土贡，做过幕僚，当过教习，做过京官，在科举道路上也曾一再顿挫。对种种社会问题，他有切肤之痛。他熟悉典章制度，知识渊博，勤于思索，对许多社会积弊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江南重赋是个不难理清的问题。同在中国，苏州、松江、太仓缴纳

① 《制洋器议》。

② 参见丁伟志：《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载《历史研究》，1993（5）。

的赋税，比同在江南的常州多三倍，比镇江多十倍，比其他省份的府州，最高的要多二十倍。这样的规定，极其不合理。考其来由，因为南宋以后，这里官田多，民田少，官田赋重。明太祖朱元璋痛恨江南人曾经帮助张士诚，在坐稳江山以后，就硬是规定这里多缴赋税。到了清朝，官田变民田，张士诚的历史旧账也不存在了，但是，江南人还是要照老规矩多纳赋。

漕粮问题也极其明显。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各种运费、保护费等加在一起，每石算下来要花十八两银子，但是，京城里领取漕粮的大多数是北方人，不喜欢吃米，于是，他们就把米拿去卖，然后买杂粮吃，每石米只能卖到一两银子。很多人干脆不领米，只领米票，把米票卖掉。这劳民伤财的陈规陋习很难变革。因为，从征集、运输、护运到分配，每个环节都有很多利益，有成千上万的食利群体，从具体办事人员到道员、总督。

土贡弊端更为简单明了。京城在北方，皇帝、皇亲国戚、百官公卿要享用全国土特产品，这无可厚非。但是，朝廷的规定有时极不合理，比如规定某地上贡的东西，并非其地特产，甚至其地本无此产品，如江苏之木蜡、桐油之类并非特产，四川之米、广西之马之类。有些规定上贡的东西，不易保存，不适合长途运输，如广西土贡面粉，跋山涉水，旷日持久，送到京城，早已霉变。但是，规定上贡就必须上贡。于是，各地就采取变通办法，到京城去买，贴上本地标签，再买通书吏一千人等，以假充真，成本比直接从市场采购高出许多倍。

至于科举之误人，军队之腐败，吏治之腐败，财政之亏空，盐政之漏私，关征之黑幕，度量衡之混乱，农桑之待兴，贫民之待济，户籍之待管，盗贼之待治，教育之待改，师道之待尊……种种弊端，尽呈眼前。冯桂芬对这些百弊丛生的现象都有深刻的思考，是他变法的主要着眼点，具体主张如下：

政治方面变革，主要包括以公黜陟改善官僚升降机制，以复陈诗改善民意上达机制，以汰冗员压缩官僚编制，以省则例、免回避提高行政效率，以广取士、许自陈、变捐例、易胥吏提高官吏素质，以厚养廉遏制官吏贪污，以复乡职加强基层建设。

经济方面变革，有农业与水利、贸易与运输、财政与税收几个方面，主张绘地图、均赋税、兴水利、改河道、劝农桑、折南漕、改土贡、筹国用、节经费、杜亏空、裁屯田、利淮盐、罢关征等等。在冯桂

芬经济思想中，政府的角色有的地方应加强，如在市场营造（统一度量衡）、调节税收、节约开支等方面，有的地方要淡化甚至退出，如漕运、土贡等，也可以说，在经济政策上要强化，在经济活动中要淡化。

社会方面变革，以收贫民救助、教育贫弱势群体，以稽户口加强户籍管理，以严盗课控制社会秩序，以崇节俭树立社会风气，以复宗法维护社会稳定，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社会措施和制度加以采用。

教育方面变革，提出办外语学校、提高教师地位（重儒官）、变科举、改会试等。他认为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有关的是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减少考试次数、改善录取方法。对于科举考试之弊端，冯桂芬有深刻揭露。但他对科举考试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其方法可用，其考试次数宜少，考试内容宜难。考试以经解、策论、古学为主要内容。其中保留了传统的一部分，也新增加了一些，如算学。主考之人，三场各一主考官而分校之。学政令大小京官举经解、策问、古学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与官职之大小。

军事方面变革，主张停武试，建议停罢大小一切武试，统一归之荐举。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

外交关系方面变革，提出了善驭夷和重专对两个问题。冯桂芬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①，驭夷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②在与列强的交往中，重专对，即重视外交谈判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在以往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若有专业的外交人员，很多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今般糟糕。

对每一问题，冯桂芬都指其症结，考其演变，开出方案，说明利弊得失。在冯桂芬以前，魏源对改进武器，改善漕运、盐政、河道等方面问题，也曾提出过一些变法方案；太平天国洪仁玕也曾提出过开办近代交通运输、开矿、立厂、办银行、设新闻馆、鼓励制造发明等一些变法

①② 《善驭夷议》。

设想，但极简略，远不及冯桂芬这么全面、系统。

冯桂芬变法主张的可贵之处，在于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近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基本上是由两类人构成的，思想家多缺乏从政经验，如王韬、郑观应，对政治运作过程不太了解，因此，陈义高而落实难；政治家又因为过于重视政治运作而短于政治理想，疏于理论创造，如李鸿章、袁世凯。前者太书生气，后者过政客化。既了解政治运作又能进行理论创造的人实在少之又少，郭嵩焘算一个，冯桂芬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官做得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这个清贵的位置上，又与许多上层官僚关系密切，从陶澍、林则徐、潘世恩到曾国藩、李鸿章，这使得他有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和内幕情况。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冯桂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尽力考虑操作可能与社会承受能力。

在《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冯桂芬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后来正式定稿时，便将这个建议舍去了。这很可能是考虑到操作难度而舍去的。在《校邠庐抗议》的《公黜陟议》中，冯桂芬本写有“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等关于民主制度的一段话，后来正式定稿时删除了。这也是他尽量不要触犯时忌的表现。比如，他提出停武试，就考虑到那些已有武科功名人的出路问题；他提出“重酒酤”，就既考虑国家利益又兼顾酒民习惯。正因为他的方案比较能够兼顾理想与现实、事理与人情、除旧与布新等种种方面的利益平衡，所以，在三十多年以后再看，依然入情入理。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大抵分三类：一是从头说，横空出世，开辟天地，开宗立派，自成体系；二是照着说，按照先圣前哲确立的思想体系，发扬光大，阐幽发微，贯彻落实；三是接着说，接续前哲，粗者精之，疏者密之，断者续之。冯桂芬是三者兼而有之。就经世致用传统而言，他是照着说，按照顾炎武的思路，一路走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顾炎武多有类似之处，留心观察，深入思索，沿波讨源，由此及彼。就改革的具体主张而言，在漕运、盐政、水利等方面，他是接着说，上接陶澍、林则徐；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方面，上接魏源。但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样理性变法纲领的，冯桂芬是第一人。他大笔挥洒，自